

與生先五雲王

育教代當國中

周傳
道宗
濟懋

一、引言

民國五十六年夏，由張曉峯先生所領導的中華學術院，曾贈授王雲五先生名譽文學博士

學位（又稱名譽哲士），其頌詞曰：

「廣東中山王雲五先生岫廬，早歲僅受數年私塾教育，然以其過人之毅力與智慧，不斷自修，學業日進，弱冠即任教吳淞中國公學及北平中國大學。中年以後，接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，嗣又兼任總經理，主編圖書萬餘種，其中萬有文庫、四部叢刊、叢書集成之印行，對於促進學術文化之發展，貢獻尤大。洎乎抗戰，以迄政府遷臺，歷任中樞要職，助猷卓著。公餘之暇，著述斐然。自五十二年辭卸行政院副院長以來，重回商務印書館，領導館務；又主持嘉新文化基金會及中山文化基金會，對於社會文化之推進，不遺餘力；復講學於國立政治大學及私立中國文化學院研究部，桃李遍天下，計自四十九年至今，出身於政大之博士共四位，其中三人之論文皆由先生為之指導，洵可謂『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』矣。先生於學無所不窺，除發明四角號碼檢字法，為中外所廣泛使用外，對於法政，造詣尤深。出版著作不下六七十種，其重要者有『岫廬論為人』、『岫廬論政』、『岫廬論國是』、『岫廬論世局』、『岫廬論學』、『岫廬論教育』、『岫廬論管理』，及『現代公務管理』等。文如其人，平和有力，內容精澁，多道人之所未道，蓋非有其德，不能有其功；非有其功，不能有其言者也。茲經本院院務會決議，贈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

，以示崇敬。」（此頌詞係周道濟所草擬，濟當時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兼教務長及政治系主任）

從這篇頌詞中，我們對於王雲五先生的成就與貢獻當可知其大概。按：岫師王雲五先生生於清光緒十四年（西元一八八八年）七月，卒於民國六十八年（西元一九七九年）八月，綜其一生，的確可說是一位多采多姿、具有多方面成就和貢獻的奇人。本文係以「王雲五先生與中國當代教育」為題，以下姑就先生在教育思想、出版事業、考試行政、及教學工作等方面的成就與貢獻，加以扼要的介紹與說明。忙中執筆，倉促成文，漏誤欠當之處，在所難免，尚請 大雅指正之。

二、就教育思想言

岫師學問廣博，閱歷豐富，一生中對於教育的主張、看法，與建議，相當之多，這些都可以說是他的教育思想。遠在民國元年，蔡元培先生被發表為教育總長，岫師其時擔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秘書，便曾向蔡總長提出有關學制方面的「建議書」。據岫師的追憶，此一「建議書」的要點如下：

「（一）提高中等學校程度，廢止各省所設的高等學堂，在大學附設一、二年的預料，考選中等學校畢業生或相當程度者入學，預科畢業生升入本科；（二）大學不限於國立，應准許私立；國立者不限於北京原設之一所，全國暫行分區各設一所。那時候我主

張，除北京原有所謂京師大學堂外，南京、廣州、武漢，應儘先各設一所；(三)各省得視需要，設專門學校，其修業年期較大學為短，注重實用。」(見「我對於民初學制建議的追述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一書中)

岫師初到臺北市時，偶然在街上見到許多小學生赤着足去上課，他對於臺灣省小學教育立即發生一個很好的印象。他認為：

「小學教育是國民教育，本來是在國家的方針下按照國民的生活而施以教育的。各級學校雖然都要與社會打成一片，而小學校更有其必要。當然理想的國民生活是以不要赤足走路為好；但在國民生活尚不免赤足走路之時，則未能超出國民生活之上的兒童，自不必如內地大都市的兒童，非鞋襪完全者不能入小學校修業。臺省教育當局，對於此一小節，竟能配合國民的生活，推而廣之，則教材之適應、時間之配置，以及其他種種，自不難一一符合教育的理想。」(見「從小學生赤足上課談起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)

但是，他對於我國中等教育，則頗有批評。他說：

「假使有人要我對本世紀以來我國各級教育的成績作一評定，我敢大膽地說：初等教育最好，中等教育最壞，高等教育有好有壞……中等教育的成績不好，原因可就複雜了。歸納起來，至少有這幾點：第一

而且是關係最大的，就是目標不明。中等教育的目標本來大別為二：第一是升學階梯，第二是就業準備……任何國家要把中等教育辦得好，這兩個目標必須分得很明確。……第二是課程繁重，缺乏重心，這

當然是目標不明所引致的結果。……第三是有些科目有名無實，形同虛設。……第四是有些科目不能普遍設施，只有極少數學生因其興趣關係而略窺門徑，這就是體育和藝術兩項。……第五是純採灌注式的教育，而不知鼓起自動的研究。這是我國各級教育的通病，甚至高等教育亦不能免，更無怪中等教育了。」(見「漫談中等教育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)

同時，他對於我國初級中學即教授外國語文，亦不以為然，而主張改從高中開始。他說：

「初中之教授外國語文不僅無何效用，且有許多不利。第一、我國文字本來不很容易學習，初中學生的本國語文根柢尚未鞏固，却同時兼習一種外國語文，其結果不是本國語文與外國語文同樣沒有多大進步，便是顧此失彼，不免有一種犧牲。如求兩種語文均有相當進步，則對其他科目自難同樣認真，甚或身體健康受到影響。第二，初級中學設置甚廣，外國語文之教師很難有充分的供應，其濫竽充數者，自身的外國語文程度過低，以訛傳訛，影響於學生之前途不淺。姑以讀音一項而論，在未會受過良好訓練之教師，將使初學外國

語的兒童，於開始時失之毫釐，終至謬以千里。假使外國語文之教學改從高中開始，則較佳之師資較易獲得，上述錯誤的開始當可避免其大半。同時，按照 *Do one thing well at a time* (一時做好一事) 的原則……初學一種外國語文，最好是連續不斷的練習，惟能如此，才可以把一種陌生的語文由習用而漸成自然。因此

，在開始時，斷斷繼續的學習，其收效是很微薄的。初中階段學習外國語文，由於時間無多，練習的機會也無多，故遠不如在高中階段把外國語文的教學時間加重，同時有訓練較佳的教師，程度較佳的同学，足以誘導砥礪者之收效較易。」(見「初中可以廢止外國語文的教學嗎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)

至於高等教育，依我國現行的法令，係包括專科以上學校、所謂專科以上學校，大別為大學校、獨立學院，及專科學校三類，其中大學校和獨立學院僅為組織上之不同，程度原無二致，故實際上祇有大學校和專科學校兩級。概括岫師對於高等教育的意見，有以下幾點：

(一) 大學校務須提高程度，不可因一時的急需，而粗製濫造；(二) 專科學校為供應目前及急需之機構，宜積極推廣，並盡量附設於原有之大學校內；(三) 大學校及專科學校均應取消入學資格之限制，而以入學考試定去取，對於大學校之入學考試應特別嚴格；(四) 大學校及專科學校均應多設獎學

額，俾聰穎而有志之貧家子女得以入學，全國人民有享受高等教育之平等機會；(五) 大學校應以成績學分爲畢業之條件，絕對取消「畢年」之制；(六) 大學校應培養學術的風氣與實現研究的精神。」(見「漫談高等教育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)

不論初等教育、中等教育、抑或高等教育，岫師強調：都應該確實做到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，不宜偏重一方面。他說：

「我國大多數的學校，尤其是專科以上學校，往往側重智育方面，因此，學生的收穫不免偏頗。歐美教育家向來對於德智體三育並重，好像立憲國的三權並重一般。但在三權憲法學說流行甚久以後，我國孫中山先生更進一步，而有五權憲法之提倡。同樣的，在歐美三育並重說流行甚久以後，我國近來也有主張五育並重的，這就是德育智育體育之外，加上群育和美育兩項。群育之首倡者，記不清楚是何人；美育則爲蔡子民先生之創說。但無論三育也好，五育也好，其共同點總是確認教育是多方面的，不宜側重一方面。……德育之目的、在提高人格……智育之目的、在運用思想……體育之目的、在健全身心……群育之目的、在鞏固社會……美育之目的、在提高嗜好。……總之，教育正如營養。人生所需的教育亦正相同。噲輕噲重，顧此失彼，在營養上固當力戒，在教育上何莫不然。」(見「與大學畢業生談五育

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)

又，值得特別一提的是：岫師很欣賞大專學生的預備軍官訓練。他說：

「假使有人問我，在過去一年間，自由中國種種的進步中，那一項具有最深遠的意義？我敢說：大專畢業生的軍事訓練算得是首屈一指。在『好鐵不打釘，好人不當兵』的傳統下，受過較高教育的人多不願接受真正嚴格的軍事訓練……在去年暑假時，政府毅然決定，所有應畢業的大專校學生，一律先受預備軍官訓練一年，始准畢業。在實行以前，固有不少人懷疑其是否令出惟行，即在實施期內，還有人懷疑受訓的青年是否都能滿意。今者一年屆滿，受訓的青年皆已如期結業，據我直接間接接觸到的受訓青年，無不深感滿足，而且在這一年的嚴格訓練下，許多受訓的青年身體健康都較受訓前有進步。這不能不對主其事者在事前對於體格檢查的認真，在實施訓練期內一切措置得宜，故能有此完滿的結果。……民主國家爲保衛其民主制度，也有廣泛實施軍事教育之必要，何況我國還有復國的大任荷在肩上，軍事教育豈不是加倍重要嗎？」(見「青年軍事訓練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)

要之，岫師對於教育的作用，注重「普」「實」「通」「專」四字，他對於「明日的中國教育」，有以下的看法：

「教育是百年大計，倘能走上軌道，則過

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也如此，絕不宜喜新而立異，也就不當有今日與明日之分。但如過去與現在的教育還未臻於理想，則隨時改進，自亦有其必要。要知道明日的中國教育有無改弦更張之必要，請先檢討一下教育的作用。教育的作用似可以四個字概括之：一是普字，二是實字，三是通字，四是專字。這四字可以代表各階段和各方面的教育作用，如能一切實做到，則教育殆已接近理想，否則就其未能做到的程度與原因，而作對症發藥的救治，當亦我國明日應爲之事。普字謂普及，指小學教育當盡量普及而言；實字謂實用，指職業教育當切合實用而言；通字謂普通，指中等階段之普通教育，養成常識豐富及有文化修養之人而言；專字謂專門，指大學教育，養成專家學者而言。」(見「明日的中國教育」，載「岫廬論教育」)

此外，岫師本其平素鑽研，自民國五十九年起，至六十年止，曾著有「中國教學思想史」一書，此書共六冊，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：第一冊爲「先秦教學思想」(五十九年四月初版)，第二冊爲「漢唐教學思想」(五十九年九月初版)，第三冊爲「宋元教學思想」(六十年二月初版)，第四冊爲「明清教學思想」(六十年五月初版)，第五冊爲「革新時代教學思想」(六十年七月初版)，第六冊爲「中國歷代教學思想綜合研究」(六十年十一月初版)。由此亦可見他的教育思想淵源之深

厚。

三、就出版事業言

岫師是我國有名的出版家。民國十年秋，他經胡適之先生的推荐，進入商務印書館（上海），擔任編譯所所長；十九年三月，受聘為該館總經理，三十五年五月，始因從政而辭卸該館總經理的職務；五十二年冬，他辭去行政院副院長之職，五十三年夏，被推選為臺灣商務印書館（臺北）董事長，實際主持全館業務，直至六十八年過世為止。可以說：岫師在商務印書館的身上實已投下了大半生的心血。他對於我國出版事業的貢獻是無比的，而其出版事業對於我國教育文化影響之大，也是世人所公認的。

商務印書館創設之初，本來只是一小規模的印刷商。自張菊生（元濟）先生加入，設立編譯所以後，才轉向於教育及新知識的出版事業，但是始終以不得通曉英語之主持人為憾。自岫師出任編譯所所長之後，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業務才不斷有新的發展。試看楊樹人先生之言：

「王先生接任第一年以內，便實施了兩件大事：（一）改組編譯所，延聘專家主持各部，計有朱經農、唐鉞、竺可楨、段育華諸君，並另聘胡明復、胡剛復、楊銓、秉志、任鴻雋、周鯁生、陶孟和諸人為編輯和特約編輯。諸君皆係我國學術界前輩。（二）創編百科小叢書、學生國學叢書、國學小

叢書、新時代史地叢書、農業小叢書、工業小叢書、商業小叢書、師範小叢書、算學小叢書、醫學小叢書、體育小叢書等等，以為此後彙編萬有文庫之張本，同時又將編譯所原來附設的英文函授科擴充為範圍較大的函授學社。王先生主持編譯，在一年以內，能有如此遠大的計畫與實施，實在是可以欽佩而羨慕的事。」（見楊樹人：「王雲五先生與商務印書館」，載「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」一書中）

當時的商務印書館，特別是它的編譯所，實際上已成為我國學術思想界的重鎮，像在臺的張其昀先生（已去世）、陶希聖先生，及查良鑑先生等，都曾在該館編譯所服務過；而該館所編印的各種圖書、雜誌、及教科書，更是風行全國，家喻戶曉。其中教科書的影響似乎特別大，凡是年歲較長的中國人，幾乎沒有人未讀過商務印書館所編印的教科書。至於該館所出版的雜誌，像東方雜誌、教育雜誌、學生雜誌、婦女雜誌，及小說月報等，對於我國的教育文化也都有很大的影響。再者，岫師於商務印書館所信行的科學管理，在我國，亦為開風氣之先的經營方式。試看陶希聖先生的回憶：

「全國思想潮流的泉源由北京轉入上海的趨勢，至五卅運動（民國十四年）而形成。商務印書館在此一趨勢之中，居於一個關鍵地位。自清末立學校，商務首先編印教科書以應學校講課之需。由坐落棋盤街兩架印書機與三四編書人，擴展至寶山

路的印刷所與編譯所，而棋盤街店面也擴大為發行所。三所之上，更設立總管理處，是為「三所一處」，構成總公司。……編輯所用的參考書又擴充為東方圖書館，其收藏之富，名聞海內外。自五四至五卅之間，正是編譯所網羅學術界人士最多之時。王雲五所長於原有各部之外，增設百科辭書編譯工作，聘請各科專家及學者，至百人以上，連同原有各部編輯，共計不下二百人。……五四至五卅之間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盛況，以及其出版物、雜誌與圖書，對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的重大影響，雲五先生與有大力於其中。依我這個小編輯的觀察，商務印書館的雜誌，每一種每一期第一二篇文章，就是當年學術思想現勢與趨勢的表徵。……雲五先生的大氣魄有大貢獻於濟濟多士，以商務編譯所為中心，擴散其學術思想於全國。……北伐之後，國家大一統的新局面，恰是商務印書館新發展的好環境。於是王雲五先生應運而起，擔任總經理，為的是整理館務，發展事業，以應時代之要求。雲五先生為此遊歷歐美，考察各國出版事業，歸國就職之後，主張實行科學管理，總經理設立研究室，網羅留學海外回國的學者二十人，為科學管理研究實施之輔佐。」（見陶希聖「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見聞記」，載「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」）

岫師所領導的商務印書館，在大陸時期，

其總館設於上海，全國各地又設分館支館，為數達三十餘處之多。根據統計，該館民國二十三年的出版物共二七九三冊，占全國出版物總冊數百分之四十五，二十四年共四二九三冊，占全國百分之四十六，二十五年共四九三八冊，占全國百分之五十二，行銷海內外，可謂無遠弗屆，故被譽為世界三大出版家之一，至於在我們中國，當然更是首屈一指了。（參看周道濟：「臺灣的出版事業」，載其所著「愛國憂時集」一書中）

在臺灣，岫師自主持商務印書館後，一方面整理重印舊籍，一方面加強出版新書。前者如印行萬有文庫叢要、四部叢刊初編與續編、叢書集成簡編、漢譯世界名著、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、百衲本二十四史、古籍今註今譯、及四庫珍本等；後者如編印人人文庫、岫廬文庫、新科學文庫、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、及中山自然科學大辭典等，對自由中國的教育文化，貢獻很大。

民國五十九年五月，岫師以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身分（時周道濟擔任該館總經理兼總編輯），曾在商務印書館之月會中，向全體同仁發表演講，對於七十餘年來該館無量數出版物中，堪稱創造性者，有所舉述。他說：

「本館的創造性出版物分爲前後及中間三期，前期（民國前十五年至民國十年）的二十五年共有七種，中間（岫師參加政府，脫離該館之時）可說一種也沒有，後期（岫師主持該館之時）共三十一年，約得

二十三種。本館第一種的創造性出版物現在看起來算不得什麼，但在七十多年前，確屬創造性，那就是華英初階與華英進階的一套讀本……（次爲）創編全套中小學教科書，稱爲最新教科書，實即是本館最舊的教科書了……第三種創造性的出版物即爲「東方雜誌」……第四種是民國初年編印的辭源……第五種是各科詞典……第六種是四部叢刊……第七種是百衲本二十四史……以上爲前期的幾種具有創造性的書籍。後期的二十三種爲：其一，是民國十年我初進本館，首先計畫編印的百科小叢書……其二，便是編印各科小叢書……其三，便是百科全書……其四，爲四角號碼檢字法……自此法問世後，本館許多工具書的索引，均照此編製，其中最大規模，當爲佩文韻府……這些索引的編製都是四角號碼的副產品，算得是在我主持下的第五種創造性出版物。其六，爲學生國學叢書……其七，爲萬有文庫……第八種：大學叢書……第九種爲四庫珍本……第十種爲中國文化史叢書……第十一種爲自然科學小叢書……第十二種爲叢書集成……第十三種爲中山大辭典……第十四種爲附索引的各省通志……第十五種是年譜集成……第十六種爲小學生文庫……第十七種爲中學生文庫……第十八種：人人文庫……第十九種是各科研究小叢書……第二十種爲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……第二十一種

，古籍今註今譯……第二十二種是新科學文庫……最後一種即第二十三種是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。」（見岫師著：「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」第一〇九頁至一一〇頁）

這裡所說的前七種，係岫師加入商務印書館以前之事，後二十三種則均爲其一手所策畫。彼時自然科學大辭典尚未印行，若今日計之，則爲二十四種矣。由此可見岫師對出版事業之貢獻，亦可見他對當代中國教育之深遠影響了。

四、就考試行政言

國家的考試與其教育有密切的關係，有時，考試的內容與出路，頗能影響教育的課程與方向。岫師從事考試行政工作雖不太久，計自民國四十三年八月，被任爲考試院副院長起，至四十七年三月，改任總統府臨時行政改革委員會主任委員爲止，在考試院爲時尚不足四年，但他基於其淵博的學識及做事的風格，對於考試的大政方針及重要決策，貢獻頗多。在即將就任考試院副院長之時，岫師曾謁訪即將擔任考試院院長的莫柳老（德惠），並當面表示：「院中用人用錢應由柳老主持，我絕不過問，但對於考試政策，我毫不客氣，願極力相助，多負責任。」（見「岫廬八十自述」，第六五至五頁）可爲佐證。這些考試的大政方針及重要決策，其中若干與國家的教育是很有關係的。

岫師由於早年與正式學校無緣，沒有輝煌

的學歷，所以很重視考試制度，特別是檢定考試制度，認為它是拔擢刻苦自勵、缺乏學歷之士的優良方法。以下是他關於這方面的議論：

「考試院創辦的檢定考試制度，是一種最大的德政。使許多沒有上過學校或中途失學的人有機會可以上進……拿我自己來說，依照我的志願，我想做醫師，或是做律師，我相信如果當初有機會給我做，我會是一個很好的醫師或律師。然而我現在是一個四不像，原因就是沒有入學的機會。

有一次我和某教育部長談起這個問題，我說：『我國現在的教育制度太嚴格了。為什麼不看看英國的樣子？英國的考試制度自印度，而印度又學自我國。到今天，我們自己却不相信考試制度，豈不甚怪？』他說：『像王先生這樣，未經過正式的學校教育，沒有考試，不是也可以在社會立定地位嗎？』但是他的話我不滿意。」

（見「岫廬八十自述」第七〇四至七〇五頁）

「反觀我國向無夜間大學之設立，又有種種之入學限制。小學不畢業不能升中學，中學不畢業不能升大學（目前大學雖已收同等學力學生，但必須高中二年及休學一年者，始可報考，而其錄取名額又有比例之限制）。固然研究所之入學尺度放寬（政大研究所初時對高考及格者亦許投考），後來因格於法律規定，仍不能授予學位。現在高普考舉行之『檢定考試』方法很

好。據一般統計，凡經檢定考試及格者，其錄取之比率占百分之八十五，較大學畢業生錄取百分比約十分之一者，實在高出若干倍，而其成績亦很優良。去年高考第一名，則係大學未畢業者。由此看來，人們在業餘自修之成績，十分良好。」（同書第六八九頁）

據說：四十三年秋，政大研究部第一屆招收研究生，所以容許未經大學畢業而只高考及格者報考，固然是由於張曉峯部長領導下當時教育部的決策，而岫師的一再建議亦有促成之功。事實上，那次以高考及格資格考取政大研究部者，約有十餘人之多（共錄取六十人），這些人以後都成為國家很卓越的人才（該校研究部自第二屆起，其招生必須大學畢業者始能報考）。

民國四十四年夏，岫師一方面為考試院副院長，一方面又奉特派為該年度高等考試典試委員會委員長；四十五年夏，亦復如此。他擔任典試委員長後，經過深切之考慮，對典試委員之遴選，擬有原則七項，性質上彷彿是規則之細則，于考試院院會中提出，略有修正，隨即通過如左：

- (一) 立監委員概不列入。
- (二) 部會長官職務繁重，無暇作實際參加，非必要不予列入。
- (三) 現任官吏須曾任教授者，俾符合選派規則第四條第四款與第五條第二款之規定。
- (四) 在臺連任多屆高考典試委員者，以輪調更替為原則。
- (五) 各科教授之選，以(1)資

深，(2)學粹，(3)聲譽高，(4)肯負責者為主。(六) 高考及格十年以上者，以曾兼教授或有專著為原則。(七) 考試委員儘量參加，各按專長加入各組。」（見「岫廬八十自述」第六八〇頁）

四十五年擔任高考典試委員長時，他更代表全體典試委員獨自入闈，計自八月九日下午六時實行入闈，在闈內共七日（參看岫師所著「入闈記」，載「談往事」一書中）。

岫師對於論文式與測驗式的考試方法，亦曾作比較研究。他說：

「有關考試技術上的困難，在西方國家採取考試制度以來，也常常遭遇到。為着消除這些困難，不少的國家曾作相當的努力，以謀改革。現在改革得最徹底的當推美國，其方式為盡量改取測驗式的試題，以代論文式的試題。所謂測驗式的試題，大別為兩種型：一是回憶的測驗（Recall Test），二是認知的測驗（Recognition Test）……以上種種不同型類的測驗，却有一共同處，就是內容都很簡單，只集中於一點，可使受驗人專就此一點作答，以觀其是否認識正確。因此，如要考驗應考人對於一科目的知識，必須就此科目準備許多的測驗題目，往往多至百數。這樣考驗的方法，答覆與評閱都很簡單，而且絕大多數是客觀的，故又稱為客觀的試題。由於這種試題的答案都是一律的，評閱標準自可一律，評閱者也可大大節省

時間；而且測驗題答案的地位往往與答案的正誤攸關，還可以利用機械的作用，以代替評閱的人工，是則不僅客觀，所省時間尤不少了。但是美國各種考試雖多採取測驗式，却没有完全廢止論文式。其主要原因則以測驗的第一型固然專用於回憶的考驗，僅足以發見應考人的記憶與勤學；然其第二型，即所謂認知型的測驗雖涉及應考人思考和辨別的能力，終嫌是片段的，缺少關聯性的……因此，較公允的結論，當是對於若干種科目仍須保持論文式的試題，俾可發見應考人發揮系統的思考和判斷的能力，並保持學者在研究過程上的優良傳統，而不使淪於支離破碎。」（見岫廬八十自述，第六九九至七〇一頁）

凡此種種，正可見岫師在主持國家掄才大典時，一絲不苟的辦事精神。

此外，岫師在考試院服務期間，對於我國大學創設博士班，亦頗有推動之功。按照我國學位授予法：學位分學士、碩士、博士三級。值得注意的是：遠在民國二十年即已公布的學位授予法，雖有「關於博士學位授予之規定」，但其後二十多年，我國學位之授予，實際上僅有學士、碩士兩級，至博士研究生之設置、博士候選人之審核、博士學位之評定及授予等，教育當局尚未舉辦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，張曉峯先生受任為教育部長，鑒於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亟待完成，學術文化工作必須加強，博士學位之興辦始見具體而

積極。其時，岫師為考試院副院長，對曉峯先生的此項主張，十分贊同，而政大校長陳大齊、政大政治研究所所長浦薛鳳等先生，亦予熱烈支持，於是政治大學遂於四十五年八月招考政治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。四十六年二月，臺灣省立師範大學亦於國文研究所內開辦博士班。其後，臺大、文化等校亦相繼設置博士班。岫師於此期間，曾發表「我國博士學位授予之研討」及「博士考」二文，為之鼓吹。他在「我國博士學位授予之研討」中，曾說：

「現因自由中國文教之發展漸有進步，研究風氣亦漸盛，校院研究所亦相繼成立，於是實行授予博士之議復起。惟是贊成早日實現者固多，而主張稍待者亦不乏人。筆者則身考試院，主持是項審查任務，竊認為今日實有積極準備授予博士學位之必要。所持理由，計有左列兩端：一、博士程度原無固定標準。授予博士學位之作用，首在鼓勵研究……經過嚴格考試之後，證實其曾作充分研究而有相當心得者，則授予學位以鼓勵之……若過分慎重，認為提早授予博士學位，難免水準過低，則從另一想像，不在國內提倡高深的研究，而惟留學外國是賴，則國內研究風氣永不能提倡，國內自行造就之人才亦將停滯於一定的水準，這那裡是求學術獨立與進步之道呢？……二、關於理工農醫方面，猶可言高深研究所需之設備需費過多，國內一時未能充分準備，不如留學他國之便利。但文

法商教之研究對象恆以本國為主，其所需參考資料以圖書雜誌為要，搜羅設備亦較易。在這一方面若干問題之研究，且較在國外研究為方便。即理工農醫方面，間亦不乏可在目前國內簡陋設備之下而進行研究者。筆者絕不反對留學，但同時亦認為國內非無不可作高深研究之機會。然欲鼓勵高深研究，則不可不對博士學位之授予，迅即超脫自卑感，與放棄過分慎重之態度。」（見「岫廬論學」）

他的真知灼見，高瞻遠矚，令人無限敬佩，這種主張的實現，不能不說是我國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五、就教學工作言

岫師基本上是一位教學工作者，一面教，一面學，「教學相長」，教到老，學到老，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」，正是他的情趣和嗜好。岫師的口頭禪：「為學當如群山式，一峯突起眾峯環」，窺之他的一生，學問廣博，而尤擅長法政，確實已經做到了。

岫師早年雖只受過零星片斷式的教育，但他在十七歲的時候（光緒三十一年），便為人師表了。這一年的十月，他應上海一所私立英文專修學校——益智書室的聘約，擔任該校的唯一教員，除英文外，尚要講授史地數學等科。光緒三十二年十月，岫師轉任中國新公學英文教員，其時，胡適之（小他二歲）、朱經農（大他二歲）等人都是他的學生。光緒三十三

年多，中國新公學併入中國公學，岫師改任中國公學教員。這時，他買了一部大英百科全書，約費了三年時間，把這部三十五巨冊的大書閱讀一遍，深受師友的讚賞。宣統元年，江寧提學使李瑞清辦了一所留美預備學堂，請岫師兼任教務長，時岫師只二十一歲，很多學生（包括萬鴻圖）年齡都比他大。

民國新成，孫中山先生被選為臨時大總統，邀岫師擔任臨時大總統府的秘書，其後又到教育部擔任公職。自民國元年九月起，岫師便在北平的國民大學（後改名中國大學）兼任法科英文教授（臧啟芳是他的學生之一），民國二年四月離開教育部後，改為專任教授，除講授英文外，加授政治學和英美法概論，直至五年六月為止。以後幾年，岫師多從事於譯書工作；十年秋，乃進入商務印書館。三十五年夏，奉邀出任中央政府的公職；五十二年底，辭去公職；翌年，重返商務印書館，以迄於逝世。

民國四十三年起，岫師受聘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兼任教授。他在碩士班開二門課，一為「現代公務管理」，另一為「現代行政問題研究」；在博士班開一門課，即「中國歷代政治典籍研究」。關於授課的情形，王壽南兄有很生動的描述：

「由於雲五先生對政治學與行政學有淵博的學識，加上又有實際的經驗，理論與實際交互配合，因此碩士班的兩門課講授內容十分充實而且生動。博士班的課是極難

講授的，中國政治典籍十分博雜，理出頭緒已屬不易，何況研究指導，幸而雲五先生是當代中國著名的目錄學專家，遂能引導學生一步步深入。他每次指導學生閱讀某一類典籍，便逼學生要交報告，每篇報告不得少於一萬字，學生們對於雲五先生逼得如此之緊，大叫吃不消，可是一年下來，學生們的確讀了不少的書，這又不能不感謝雲五先生的『逼』功了。」（見王壽南：「當代具有多方面成就和貢獻的奇人——王雲五先生」，載「我所認識的王雲五先生」一書中）

自五十三年秋以後的幾年間，岫師同時也擔任中國文化學院（即今日的中國文化大學）的兼任教授，在該校的高級研究班（後正名為博士班）講授「中國行政問題研究」課程。

五十八年秋，岫師高年八十二，請辭政大教席已獲准，於是退出杏壇，專心從事著作。按：岫師是四十三年任政大政研所，到五十八年秋，恰滿十五年，其初十年為兼課，後五年為專任（參看「岫廬最後十年自述」，第二五八至二五九頁）。

在政大政治研究所，岫師是主要的論文指導教授，他先後共指導碩士論文二十三篇，博士論文九篇；在文化學院三民主義研究所，他也曾指導過一篇博士論文。有這麼多研究生找他指導論文，其原因，據他自己解釋道：

「我想除了我不怕麻煩，無論怎樣，學生們有所請教，無不樂予相助以外，或因其

不是一位專家，却對於各種學科都略曾涉獵，尤其是讀書極多，至老不倦。所以做論文的研究生要我指導其搜集資料，多半不至於失望之故。此外，我還有一種特性，對於研究生的指導，絕不採取武斷態度。研究生對某一論點，能自圓其說者，無不聽其自我表現。我認為研究生撰著論文，當視其搜集資料與分析論斷所費的工夫，藉以訓練其再進一步，以從事於學術的深造。因此，研究生的論斷，縱與傳統的或正統的主張不符，只要能自圓其說，不致違反邏輯者，不妨許其自持一說。」（見「重理粉筆生涯」，載「談往事」）

有人稱岫師為我國「博士之父」，實非偶然。方今有不少對國家社會很有貢獻的人士，都出自岫師門下，猗歟盛哉！

岫師在其所著「岫廬八十自述」一書的結尾，談到他今後的願望時，表示：

「老實說，我有兩個願望，各趨極端，一是最底的，又一是最高的。所謂最低的，便是想參與我向未擔任過的最低級教學，也就是小學生和幼稚生的教學。記得幾年以前，我曾對一些朋友說過：在光復大陸以後，我能逍遙林下，而身體頑健，我真願擔任一所設在鄉區的小學校校長，而且還附設一所幼稚園。因為我覺得和幼童在一起，其天真的情形，與其智慧的發展，均極饒興趣，對他們加以啟發，是最愉快不過的事。所謂最高的，便是想組織一個

高級研究所，特別是關於社會科學方面的，參加研究之人，當以獲得博士學位者為準。」

早在民國五十三年，他便草擬了一個計畫，名為「社會科學綜合研究所設置計畫」，曾在岫廬論教育」中發表。他在這個計畫的前言裡說：

「我認為社會科學的各科系互有密切關係，因此，要研究任何一個有關社會的問題，斷不能專由研究與此問題有直接關係的一二專家逕予解決，必須會同若干與有間接關係的專家，從許多不同的角度研究，才能獲得完滿的解決。例如：一個有關經濟的問題，往往涉及政治、財政、社會、教育、法律、國際關係等，若專由經濟學專家來謀解決，殊難澈底。同時又獲悉美

國普令斯頓高級研究所之設置，在使獲得博士後（Post Doctorate）之人士從事研究。乃略仿其意，於五十三年新歲多暇，草擬社會科學綜合研究所設置計畫……

這個社會科學綜合研究所分明是一個重視科際整合的研究機構，如今中央研究院及臺大的三民主義研究所約略近之。由此可見岫師對教學工作的偏好，亦可見他對中國教育的關心。

六、結 論

岫師以其過人之資，及旺盛的苦學、好學精神，加以閱歷宏富，享壽甚長（得年九十二歲），其成就與貢獻的確是多方面的。他是一位出版家，也是一位政治家，更是一位教育家。即以教育而論，他對中國當代教育的貢獻與

影響，也是很可觀的。

他以出版家的地位，對中國教育、文化、學術的貢獻與影響，是世人所公認的；他以從政者的身分，對中國教育制度的改進，特別是博士班的創立，其貢獻與影響也是很多人所津津樂道的；作為一個教師，他教導過一批一批的學生，不知為國家培植了多少優秀的人才，其貢獻與影響更是廣大而深遠；他的教育主張，其中有若干（如初中不宜授外國語，應改在高中加強教學等），迄今雖未實現或施行，但有心人士受其啟示，自會加以不斷研究或運用；他在少年時期，只受過很少的正式學校教育，而至晚年，卻有那麼多的輝煌成就，這種刻苦自勵的精神，不但值得國人效法，實際上也鼓舞了無數的有為青年，論其對教育的貢獻與影響，恐怕尤為珍貴吧！

人人文庫二五九一—九二

對聯之研究與學習

對聯是我國獨特文體，具有藝術、教育、應用、娛樂的功用。本書經有系統的探究整理，介紹其基本知識與寫作方法，並各列舉實例說明，極便於欣賞、講習及參考。

張 治 著
售價 二七元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